



毛泽东

与 林 大 斯
赫 鲁 晓 夫

- ◆ 尼·特·费德林
- ◆ 伊·弗·科瓦廖夫
- ◆ 安·梅·列多夫斯基 等著
- ◆ 彭卓吾 译

交往录

东方出版社



与
斯大林
赫鲁晓夫

- ◆尼·特·费德林
- ◆伊·弗·科瓦廖夫
- ◆安·梅·列多夫斯基 等著
- ◆彭卓吾 译

与 斯大林
赫鲁晓夫

交往录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罗世缙 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等著 彭卓吾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

ISBN 7-5060-1774-1

I. 毛… II. ①费…②彭… III. ①中苏关系-史料②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IV. ①D822.351.2②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026 号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

MAOZEDONG YU SIDALIN HELUXIAOFU JIAOWANGLU

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等著 彭卓吾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62 千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060-1774-1 定价:20.00 元

(内部发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 (1949 年 1—2 月)	
..... 安·梅·列多夫斯基(1)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往来电报 (1949 年 1 月)	
..... C·JI·齐赫文斯基(54)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谈判 (1949 年 12 月—1950 年 2 月)	
..... 安·梅·列多夫斯基(71)	
1950 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是谁决定的:是斯大林还是 毛泽东? 沃龙佐夫·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119)	
一位目击者眼中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	
..... 奥·鲍·拉赫马宁(137)	
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164)	
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 ...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201)	
斯大林和毛泽东 尼·特·费德林(209)	
斯大林于 1953 年在莫斯科同周恩来的谈判和赫鲁晓夫于 1954 年在北京同毛泽东的谈判 康·伊·科瓦利(254)	
1958 年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争论 尼·特·费德林(283)	
附录一 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 沈志华(292)	
附录二 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1958 年 7 月 22 日)	
..... (305)	
附录三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 邱静(315)	
附录四 斯大林同周恩来的谈判 (1952 年 8—9 月)	
..... 安·梅·列多夫斯基(327)	

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

(1949年1—2月)

安·梅·列多夫斯基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遭到失败和共产党政府于1949年10月上台执政之后,美国围绕着如下一个问题展开了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这个问题是:“是谁丢掉了中国?”也就是说,由于谁和由于什么而使美国的对华政策遭到失败,这种失败意味着美国丧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非常牢固的统治地位。

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白皮书》认为苏联是使国民党失败以及相应地使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罪魁祸首。在1949年联合国大会第4次会议上,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对苏联的控诉书,这份文件的名称是:《因苏联违犯1945年8月14日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和违犯联合国宪章而对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不受侵犯以及远东和平造成的威胁》。在这份控诉书中苏联政府和苏联军事统帅部受到的指控是:(1)它们制造障碍使中国政府军未能及时进入东北并在那里建立中央政府的政权;(2)它们在撤走自己的军队时把东北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为中共打开了由华北自由进入东北的通道,帮助中共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将从投降的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完全交给了中共;(3)苏

联政府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同东北共产党政权秘密签订了一系列向中共提供物质技术援助及其他援助的协定与合同。

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在其声明中指出,苏联的行动、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和支持是使国内战争有利于中共这一结局的决定性因素。^①

20世纪60年代,从相反的立场出发展开了一场反对苏联的宣传运动: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开始对苏联的对华政策和斯大林本人进行批评。他们起初是在一些内部讲话中,后来便在一些公开讲话中对苏联和斯大林提出了许多要求和责难,其中主要的要求和责难可归纳如下: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帮助了国民党,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1945年之后,斯大林干涉了中共的内部事务,“妨碍了中国革命”,“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不准许中国革命”,等等。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这些论点后来就转移到了中国历史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的著作之中,于是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苏联不帮助蒋介石政府抗日而是只帮助中国共产党的话,如果苏联不同蒋介石政府缔结友好同盟条约的话,如果斯大林不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向中共领导提出某些建议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时间就会早得多。

由于这些言论的影响,于是在阐述苏中关系问题方面,在说明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共取得胜利所起的作用方面以及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一切在西方的历史著作中就发生了转变。很多西方的著作家开始发挥一种说法,说什么苏联当时对中共的帮助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对国共两党斗争的结局并没有起什

^①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安·梅·列多夫斯基所著《美国对华政策和苏联外交》一书,莫斯科1985年俄文版第191—211页。

么重大的作用。许多作家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毛泽东的说法,说什么斯大林“妨碍了”中国革命,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等等。

毛泽东虽然早已离开人世,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些说法却反复不断地出现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作家们的著作中。近几年来上述说法中的某些论点在俄罗斯作家们发表的一些作品中也能看到,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在一种情况下,是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袭了已经形成的思想观点或立场;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一些旧的立场和“冷战”时期的那一套行为规则在起着惯性作用;在第三种情况下,则是一些人在批评苏联政策方面竭力赶“时髦”。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当年联共(布)和中共之间、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相互关系的说法,多半都带有投机性和抽象性,并没有以对最重要的文献资料的研究为依据。

近年来俄罗斯一些档案馆开放,研究人员能够对其加以利用,这就在如下两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这就是他们可以对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这一极其重要时期的一些事件予以说明;他们可以对40年代末—50年代初莫斯科对华政策给予中国一些事件的进程和结局所产生的影响做出客观评价。

在这方面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与米高扬在1949年1—2月份秘密前往西柏坡(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位于华北)有关的文件、米高扬同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记录、米高扬同莫斯科之间以及斯大林同毛泽东之间的密码通信。在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档案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文件。

先稍微谈谈斯大林同毛泽东往来电报的一些特点。这种往来电报是通过无线电联络进行的,属于绝密。当时在苏联最高层领导人中,除斯大林之外,只有他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亲密战友才不仅

知道那些密码电报的内容,而且还知道在莫斯科和延安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联络。而无论是在苏联外交部中,还是在苏联驻华使馆中,对此都无人所知。在莫斯科,这种无线电联络是通过苏联国防部情报总局的渠道进行的。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在情报总局中办理特别重要公务的职员,他们一方面把斯大林的一些密码电报发往延安,另一方面接收从延安发出的毛泽东的密码电报,并亲手将其交给斯大林本人。从延安发出的毛泽东的电报是由在延安的斯大林的秘密联络员即医务部门的将军安·雅·奥尔洛夫转发的,他是为完成上述使命带上一部无线电台奉派到延安的。他在发往莫斯科的密码电报上的署名是“捷列宾”。

我要指出,当中国内战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往来电报也进行得最频繁。我们苏联驻华使馆的人继续奉行着禁止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方针,确切些说,就是我们奉命要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来,实质上就是既要保护中国共产党人,但又不在表面上给人以口实,让人指责我们在干预国共两党冲突中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在处理同蒋介石政府以及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关系问题方面,我们奉命也要表现出这样的灵活性来,就是要把外交方面的灵活性同捍卫苏联利益方面的坚定性结合起来。这种方针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1946年时中国由于广泛开展的国内战争所形成的局势。1948年5月中旬由苏联外交部转发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领导的指示中指出:

1. 苏联驻华大使馆在同中国政府及其机关的关系方面应采取有分寸的和完全政府方面的态度。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在同中国政府及其外交部的代表进行交际时不应越出官方关系的界限。

2. 大使应当同政府部门的进步人士保持关系,不排除通过他们对与之有联系的政府中的领导人施加影响的可能,其目的是解决与保护苏联利益有关的各种问题。

3. 如有对中国政府怀反对思想情绪的人士向大使提出请求时,以及政府官员请求大使对中国政府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时,大使应只根据 1945 年缔结的苏中条约在这个问题上所规定的苏联政府的立场和以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原则所决定的立场来回答问题。

4. 大使应当坚定地捍卫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表现出警惕性来。

(1)在政治方面:

要对个别人敌视苏联的行为和攻击及时予以反击,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请政府人士对此予以关注,或者是在苏联外交部的同意下向报刊界发表相应的声明。

(2)在经济方面:

通过政府机关,个别情况下也可面见蒋介石,促使中国方面履行对苏贸易协定所承担的义务。

在这些问题上要对苏联商务代表处予以协助。

“根据 1924 年的条约,维护俄国教会在华的财产,以及维护旅华苏侨的合法利益和私人财产。

5. 在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同日本的问题方面,大使应当在同中国人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谈话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同苏联采取一致的立场,对中国来说是十分需要的。

6. 鉴于一些民主组织和进步组织目前处于非法地位(例如在莫斯科,人们通常把一些共产党的组织和亲共

产党的组织叫做在国民党中国的苏联代表。——安·列·注),所以在同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会见和谈话时,要特别谨慎。在同进步人士谈话时,要以谨慎的方式查明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设在华南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设在香港的民主同盟的活动。

7. 要密切注视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要注意弄清楚在下列问题上的资料和事实:

(1)在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斗争中,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同情和支持;

(2)美国资本渗入中国的形式和规模;

(3)准备在中国建立反对苏联的军事进攻基地;

(4)在损害苏联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的情况下,以及在策划反苏政治运动和采取其他措施的情况下,同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各组织的合作(合作的实质、形式和方法)。

大使还应当注视英国的政策以及美国、英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之间现有的矛盾。

9. 要更广泛地利用中苏文化协会、中俄文报刊、“国际书店”、“苏联影片出口公司”代表处及其他组织,以便在中国以适当的方式介绍苏联的生活和政治。

10. 要努力做到把在上海和天津办的白俄报纸予以关闭。

11. 要认真而系统地研究中国政府在内外政策方面和军事经济状况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还要认真而系统地研究国民党军事统帅部和国家财政方面的计划和措施以及这些方面的种种变化,要及时地将这些问题报告

苏联外交部。

12. 不要回避同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大使进行交往,要同他们保持官方的、有礼貌的关系。

不要与他们争论中国共产党人问题以及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其他一些问题,更不要同他们坦诚相见。

在一切情况下都要声明,苏联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下面简单地谈谈米高扬中国之行的经过史。正如一些文件所证实的,米高扬的中国之行是代替曾经计划的、但直到1949年12月底没有实现的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赴苏的问题早在1947年初就提出来了。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其条件是要对此绝对保密。斯大林于1947年6月15日发给秘密联络员即安·雅·奥尔洛夫医生^①的电报中写道:“请

^① 安·雅·奥尔洛夫(?—1949年)——当时为了密码通信,他使用了一个化名“捷列宾”。奥尔洛夫(密码电报上的署名是捷列宾)·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是红军医务部门的一位少将,外科医生,他同总参谋部的另外一位军官一起,于1942年1月被派往延安,住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谋部寓所。他的任务是为毛泽东及其家人治病,并保证通过由莫斯科专门提供的无线电台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进行密码联系。

捷列宾少将在坚决的请求下,于1949年年中返回苏联。他在延安时没有带家属,生活和工作在一个窑洞里(对于毛泽东和所有其他的中国工作人员来说,窑洞既是他们的住所,也是他们的工作室)。奥尔洛夫-捷列宾向莫斯科的领导写道:长期处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孤身一人,没有家室,他的健康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害,使得他的神经处于极端紧张的情况下。

我们不知道奥尔洛夫-捷列宾于1949年年中从中国回国后的命运如何。但是我知道有人对他进行告密。不知道是毛泽东的人对他告密,还是别的“情报员”对他告密,这种告密对他在延安的行为进行了诋毁。

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对他的莫斯科之行不宜走露任何风声。如毛泽东也认为应该如此,那我们觉得,以途经哈尔滨前来为佳。届时如需要,我们将派一架飞机迎接。请将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和他的愿望电告。”^①但是两个星期之后,即1947年7月1日,斯大林给奥尔洛夫发来了一封具有另一种内容的电报。他写道:“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如无毛泽东指挥可能对作战产生不好影响,所以我们认为,以暂时推迟毛泽东赴苏之行为宜。”^②

在以后的往来电报过程中,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一事预定在1948年7月中旬成行。但是毛泽东于1948年4月16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知说:“我决定提前启程赴苏。拟于6月初从河北省阜平县(位于石家庄市北100公里处)出发,在部队掩护下过平(北平)张(张家口)铁路……大概于6月初或中旬即可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赴贵处……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同联共(布)中央的同志们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指示……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各国一行,想对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形式进行考察。”毛泽东准备带上如下一些人与自己同行,他们是任弼时^③、陈云^④以及两个秘书和另外几个工作人员,即译电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如您同意所拟计划,我们将照此执行。如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39全宗第1目录第31卷宗第23页。

② 同上,第24页。

③ 任弼时(1904—1950)——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④ 陈云(1905—1995)——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成员。

不同意,那就只剩下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① 1948年4月29日斯大林复电说:“4月26日来函收悉。偕行者及人数请视必要自定。两位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同意在哈尔滨留一部电台。其他一切待面议。”^②

但是不久,即5月10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建议毛泽东推迟动身:“鉴于您所在地区事态的发展,尤其是鉴于傅作义^③部队已开始向余县^④进攻,也就是说您赴我国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皆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没有您的指挥会不会影响事态的进程,而您穿过这些地区又能安全到什么程度。有鉴于此,能否将您来苏时间稍予推迟。如您决定不予推迟……请通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⑤毛泽东于当天即5月10日就作出了答复:“斯大林同志,大函今日收悉。甚为感激。鉴于目前情况,将我赴贵处时间稍予推迟为宜。……我需略加休息,尔后始能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待查清后奉告。”^⑥

毛泽东于7月4日通知斯大林:“我的健康状况与两个月前相比,已大为好转。我决定于近期内前往贵处。赴贵处有三条路可走:空中、海上和陆地。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途经哈尔滨,因我与东北许多负责同志有话要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39全宗第1目录第31卷宗第30—31页。

② 同上,第32页。

③ 傅作义(1895—1974)——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将军,当时是华北集团军的总司令。

④ 此地名系按拼音(Юйсянь)翻译。——译者注。

⑤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39全宗第1目录第31卷宗第33页。

⑥ 同上,第34页。

飞抵威县^①……如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至指定港口……如空路和海路对我们皆不可能,那我们反正都要于本月 15 日前后北上。”毛泽东通知说,与他同行的将有 20 人,如走空路,请派两架飞机来。^②

7 月 14 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捷列宾转。请将下述情况转告毛泽东:‘鉴于征粮工作已开始,诸领导同志从 8 月份起将分赴各地,至 11 月方回。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在 11 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③

安·雅·奥尔洛夫在 1948 年 7 月 14 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毛泽东请转告以下回答:“斯大林同志,同意您 7 月 14 日电报中所述意见。我们将前往贵处的时间推迟到 10 月底至 11 月初。”^④安·雅·奥尔洛夫向莫斯科报告他在向毛泽东转交斯大林的上述电报时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及所得到的印象时写道:毛泽东对于苏联诸领导人忙于征粮工作的说法并不信以为真。他说:“难道苏联对征粮工作如此重视,竟然使得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人都要去从事这项工作吗?”奥尔洛夫写道:“根据 4 年多来我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在听人翻译时脸上露出微笑和嘴上说‘好,好,好嘛,好嘛,’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是满意的。这是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得出来的。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是拒绝给他派去飞机或船只。不过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何况莫斯科已经表示愿意提供飞机。他相信,正是现在,他就要动身

① 此地名亦系按拼音(Вэйсянь)翻译。——译者注。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 39 全宗第 1 目录第 31 卷宗第 35—36 页。

③ 同上,第 37 页。

④ 同上,第 38 页。

啦。显然,莫斯科之行对他本人来说是需要的。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答复……毛泽东已经在装行李箱了,连皮鞋都买了(他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平时穿的是布鞋),厚呢子大衣也缝好了。事情不仅仅在于外出本身,而且是动身的日期也已经定了。剩下的就只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了。现在他表面上看起来显得很镇静,很有礼貌,也很细心,表现出纯粹是中国式的客气样子。但他内心的真实情况则很难看出。任弼时给人的印象是,他没有预料到动身会延期。梅利尼科夫^①对我说,7月15日这天,毛泽东关于粮食收购的说法也向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②

安·雅·奥尔洛夫在1948年8月28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通知了他同毛泽东的最近一次谈话,谈话中谈到了毛泽东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一些问题。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不是急于赴莫斯科的话,那么现在,1948年的局势就已经起了变化,他想尽快地到莫斯科去。他有很多话想在那里讲,在有些问题上他要请教,在有些问题上他要请求在可能范围内予以帮助。

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谈的问题是:

1. 关于同一些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

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 关于联合东方各种革命力量和关于东方各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之间的联系。

3. 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进行斗争的战略计划。

^① 梅利尼科夫——第二个苏联医生和莫斯科的秘密联络员。他的真名和出生年代没有查明。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39全宗第1目录第31卷宗第40页。

4. 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的工业,其中包括(尤其是)军事工业、采矿工业,恢复和建筑交通道路——铁路和公路。在那里要把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东西都讲出来。

5. 关于价值 3000 万美元的白银贷款。

6. 关于同英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政策(路线)。

7. 在一系列其他重要问题方面。

毛泽东对上述一切加以总结时着重指出:“应当就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方面达成协议。”^①

毛泽东在 1948 年 9 月 28 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在一系列问题上我必须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及其主人报告,(以便)得到指示,我打算按照上一封电报中指出的时间前往莫斯科。现时我将上述情况大体作一报告,请转告联共(布)中央及其主人同志。衷心希望给我们以指示。”^②

毛泽东在 1948 年 11 月 21 日发出的电报中,借口身患微恙以及忙于与前线作战有关的问题,请将他的莫斯科之行改在 1948 年 12 月底。^③但是在 1949 年 1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④,通过一项决定再次推迟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而代之以把米高扬派往中国的做法。米高扬被委托同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会谈,要对他们向莫斯科提出的问题发表苏联领导的意见,要把中共中央的各种请求和愿望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报告。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 39 全宗第 1 目录第 31 卷宗第 41 页。

② 同上,第 42 页。

③ 同上,第 49 页。

④ 见米高扬的报告。

米高扬在下面发表的报告(该报告于1960年9月22日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叙述了他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谈判的主要内容。报告中引用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于1947—1949年期间往来电报中很多以前人们所不知道的材料。根据很多直接引文来判断,米高扬在准备自己的这个报告时,掌握有这些文件。此外,在米高扬的报告中只反映了报告中所附的许多电报及他同中共领导人多次会谈的记录中所包含的多方面情报的一部分,而这些电报和记录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问题,如对内对外政策问题,苏中关系问题,等等。就其数量和重要性来看,这些材料能够(也值得)编辑成一个文件的单行本。

在奉献给读者的将发表出来的材料编辑成的这个版本中,收入了前面提到的米高扬的报告全文以及主要根据专题原则所收集的广泛摘录(这些摘录摘自报告中所附的产生于1949年1—2月份的各种文件)。

现发表的各种文件中所出现的地名和人名,用的都是当前的拼写法。

米高扬关于1949年

1—2月中国之行

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

应退还苏共中央

发至全体苏共中央